

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

伍 麟

〔摘 要〕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工作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具有民生国家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重要执政创新。中央的政策指向、原则方略、基本要求同地方的落地做实、工作细化、任务分解相承接,反映了试点治理的央地关系。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权力精英领导动员体现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运行架构组织动员保障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支撑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参与力量整体动员营造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关键词〕 国家动员;权力精英;运行架构;专业系统;参与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近些年,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中央部署示范联系点到试点地区逐步开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国家民生关怀广泛性、社会利益长远性的特点,是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业探索中的一项创举,也是不断大胆摸索经验、勇于创新、积极推进的过程。从国家动员视角来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表现出权力精英的领导动员、运行架构的组织动员、专业系统的技术动员和参与力量的整体动员等四个方面,它们为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创造了良好的治理空间。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讲,民生心理关怀是指国家从目标追求、制度设计、运行模式和行动策略等方面,系统化疏导社会情绪,平和心态,引领价值取向和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有效维护社会健康稳定。在实践中,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需要政治优势、制度执行、体制力量和社会情感达成有机统一。

一、权力精英领导动员:民生心理关怀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自上而下、垂直分级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地方对中央布置的工作能够高度认同,精心完成;另一方面,中央需要全局把握、整体督导。中央布置的重大专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政治任务属性,需要在政权体系中贯彻、实施和完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地方都有较高政治站位。在提出当地的建设目标时,通常不是只盯着完成中央要求的“规定动作”和指标任

伍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8VZL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务。仅仅完成中央部署的基本工作目标是不够的,“达标”是底线要求。试点地方都有愿望有谋划有行动,珍惜中央布置下的试点机会,也看作是一种政治荣誉。出发点是追求既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又能够基于地方特色探索出某种具有优势、可出实效的经验模式,给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奉献力量。中国政治精英基于务实的精神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吴忠民、贾双跃,2018)。地方基于向上给中央交出优秀成绩,向内提升地方治理效能的考虑,在中央统一文件基础上往往都会有自己更加细致的计划安排和措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工作部门非常多,包括教育、卫生、政法、民政、宣传、妇联、残联、工会、共青团等十多个甚至几十个单位部门及群团组织,经历过政法部门牵头到政法部门和卫健委共同牵头的过程。该项工作统筹协调难度大、分工协作较为复杂。由于覆盖面很广、受益群众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试点地方的市、区、街道级政权一般都成立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长人员的情况各地不一样,有书记市长共同担任双组长的、也有市长担任组长的。但多数情况下,地方党政一把手更主要是宏观领导这项工作,并不总是盯在一线。往往在市级层面由党委政法委副书记来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呈现出“首脑挂帅、专职领衔”的领导机制。

首先,由政法委领导出面负责和组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民生心理关怀的领导权威性和整体动员能够充分体现。政法委领导在地方组织架构中处于非常关键的核心岗位,同上下的联系沟通都非常顺畅。往上,政法委领导可以非常便利地同自己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汇报沟通,及时传递工作进展信息,分析发展态势,并取得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重视和信任,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和资源上的照顾。往下,政法委领导在基层部门单位具有较高的威信。在落实具体专项工作上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宣示和政治导向,表明专项工作在一个时期对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极端重要性,释放出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勠力同心、干出成效的政治动员。

其次,能够担任政法委领导的同志通常是政治上的精英、业务上的能人,也是我们常说的“关键少数”。政法委领导重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工作,能够将自己的政治优势和人脉资源充分发挥出来,传导到政府的行政部门和专门的事业单位。促进这些部门和单位广泛动员、利用专长、创新思路、调动资源、让民生心理关怀取得实效。政法委的部门领导工作经验丰富,往往在多个重要岗位经过历练,具备统揽协调专项工作的突出能力。他们在当地的党委和行政系统积累有优势性的政治资本和人脉网络。这些政治资本和人脉网络在跨部门行业进行统一认识、机制设计、布置任务、整合力量、监督评估等时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能够担任政法委领导的党员同志通常政治觉悟高、党性强,推动工作积极。作为主观色彩显著的心理建设成效较难具有直观的量化考核标准,工作成效的显示度比较模糊、不太容易精确标定,部门单位之间的成绩也无法直接对比。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每项工作都需要有明确的、大张旗鼓的激励政策才能达到理想目标。但是,我们也无须回避激励政策在促进基层工作的重要作用,它能够旗帜鲜明地传递组织的选人用人标准,将组织意图明白无误地传导到基层干部心中。可以参照其他专项工作的激励经验,注意树立典型人物,发挥榜样作用,大力宣传和优先提拔在心理建设专项工作中“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基层一线干部,以工作实绩为根本标准,在工作考核、政治荣誉、物质待遇和评奖评优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倾斜。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探索性、常规化任务。完成这项工作的客观物理指标难度算不上艰巨,主要集中在空间场所及人员配置等量化达标要求等方面,一般都能够较好实现。真正难度大的是完成一些主观化、数量化指标尚不成熟的概念目标。所有参与试点工作的地方政权都把调配、统筹、整合资源当作重点工作来抓。在其他具体方面的工作承接方面,试点地方也表现出明显同质化趋势。部门广泛发动、人员协调合作、资源补充输入成为完成中央部署“五个规定动作”的基本措

施。地方政权具有很强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在压力包围环境中必须服从中央部署工作的任务安排、时间进度和评估考核,同时服务与满足基层群众民意诉求,统筹协调政策落实、地方实际和群众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长期成熟稳定的央地关系之下,地方政权已经具备超强的政治领悟力、判断力、动员及创新能力,能够依据中央部署工作的政治属性强度、完成时限进度、任务内容难度和群众工作广度等,提出相对应的固定化和超常规的治理模式、反应机制和工作路径。需要建立专责的行政主体,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协调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辛自强,2018年)。

经过几年探索工作,一些地方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声有色,基层积极性很高,主动作为非常普遍,地方主政官员越来越多从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角度考虑问题,使得心理建设事业取得开拓性进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一定范围铺开。试点地方在心理建设的资源投入、工作创新、力量夯实和队伍整合等方面可谓下了大成本,力度之大、影响之广、涉及之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应当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工作指向有重点人群关注,也有全民整体覆盖,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表现出较多柔性的色彩。因为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探索特征,加之我们这个大国,地区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区域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中央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完成的时间期限和固定成效。这样也是实事求是的,符合我们国情,也符合心理服务的科学规律。政党领导是指政党在实现自身价值目标过程中,基于政党主张对自身所代表的社会公众加以组织、引导和带动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被政党成员和社会公众接受认可,政党便在事实上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权(王韶兴,2021年)。中央对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暂时没有提出时间期限和具体做法上“全国一盘棋”的明确要求,就是留给地方创新的空间。“以时间换空间”,地方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政治智慧,充分发挥积极性,尊重区域差异,在政治方向、思想认识和社会治理原则高度统一的前提下,鼓励大胆创新、积极实践、积累经验。

二、运行架构组织动员:民生心理关怀的制度执行

试点地方均采取了集成式、整合型动员模式,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形式推动开展工作、研判工作态势以及督导落实工作措施。可能也是受到其他专项工作的启发,试点地方一般从上而下都会成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这种组织层级对应下来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模式较为统一,组成人员归属部门上也非常相似,因此所对应的行政职权和重点任务亦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地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主要肩负政治动员和落实监督的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则承担事务协调和推进工作的具体任务,发动不同部门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履行部门职能的同时,以系统工程的思维实质参与工作合作,既精心当好主角,有热心参与配角;以政治责任感和工作实效对待基层社会治理的心理建设。整体性治理,追求公共利益和法律责任的整体价值以及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无缝隙服务,运用信息技术平台,对碎片化的治理层级、分权模式、公私合作进行有机整合(王敬波,2020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具有柔性执政的色彩和刚性执政的要求,但绝大多数时候采取的是常规治理的方式,几乎没有运动式治理的任何迹象。

“经验学习”既是中央又是地方极为认同的提高执政能力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学习人家的优秀经验,地方政权节约了执政资源、节省了时间成本,避免了“多走弯路”。经验学习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显著的导向意义和效率价值。典型经验是经过一定时间基础上成功实践的考验,在局部地方区域取得明显成效,其机制、过程和结果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经验学习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借鉴和创新意义上的优化提升。中央一直重视经验典型的宣介,从各地优秀做法中选择突出个案,在工作简报中表扬推广,以促进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权对于优秀治理经验的学习非常及时

和富有热情。“等”“懒”“靠”已经基本在地方执政实践中没有了市场,地方能够主动通过经验学习快速掀起本地工作的局面,并且在大多数同质化的行动措施之下,积极创造结合当地实际的新意和亮点,力求有突出成效。各试点地方看起来是不约而同采取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形式推进工作,并且呈现市、区、街道三级压实模式。这种层级型的组织工作模式在地方政权社会治理当中很普遍常见,也非常有效,能够实现责任下压和全领域关注。垂直而下的三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工作的直接推进组织,市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是枢纽,全盘统领辖区的工作进展。在市级层面进行专家人才调配,充实到各区的专业队伍之中;联系市级部门整合人力和物质资源,有序向下输送;提高三级联动效率,接受基层的信息上报,汇总解决基层困难。三级推进的工作机制具备较好的组织优势,横向上可以显著增强部门间协作配合的政治意识和工作责任,纵向上能够加强上下级信息互通互联,克服部门行业之间的职能界限,在较短时间里打开工作局面,获得社会良好反响。

在中央明确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及示范联系点之前,各职能部门所负责的心理建设也处在经济发展态势之下。只是总体看来,部门所辖的心理建设工作还是限制在有限系统内的局部工作,有的在部门系统内部工作当中还会处于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功能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心理建设已经上升到社会治理的战略高度。中央从营造“积极、理性、阳光、平和”社会心态的高度,探索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内涵,深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心理建设越来越超出少数部门的专业局限,扩展至社会全域分人群、分层次的系统化国家行为,代表着心理建设从分散式职能介入到系统型职能关注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背后带来重要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观念进步,也是检验新时代地方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执政能力的宝贵机遇,同时也检验地方以下各级基层政权所辖部门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的效能,打破部门的本位主义思想,在社会治理的大格局之下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维度。对试点地区相关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相关学术成果的理论反思,都应建立在对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之政策愿景与行动逻辑的全面准确理解之上,才能更好凝聚学术共识和行动方向(张淑敏、吕小康,2021年)。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贯穿着系统论的科学方法。体系决定了采取“上下联动、部门协作”的必要,使得心理建设的治理效能不仅仅依附在部门内的业绩考核,而是各参与部门作为专项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推进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尽管运动式治理有特殊的效果,但也不必普遍使用。心理建设的属性决定其不适宜运动式治理,更适用常规式治理。只是需要在常规式治理当中探索新的路径和措施,把能够在体制内的资源动员组织好,把通过政府购买活动的社会资源管理使用好,把民间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力量充分利用好,通过各类资源的集中与盘活,把心理建设关注的通道能够真正随着基层行政末梢到达以往治理不及或者空白的地方。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试点地方一般不存在资源有限的困境,即使有些困难,也完全可以争取获得资源输入和补充;一般也不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的障碍,更多是治理实践的大胆推进问题。因此,最为关键之处是地方政权的治理力量需要善于动员和使用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源,将体制内的专业人员及行政人员、社会组织的行业人员、民间组织及非组织化的人员有机统合起来,发挥合力的优势,在社会最广泛层面上营造积极社会心态的良好氛围。

三、专业系统技术动员:民生心理关怀的体制力量

地方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人才队伍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原本就在体制内专门从事精神卫生、心理治疗服务或业务涉及心理领域的干部及技术人员。体制内的干部及技术人员通常具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身份,开展的工作往往是履行法定义务和完成职业要求。比如,精神卫生机构

中的医师、各级学校中的心理健康指导教师、司法机构中的心理矫治人员等。二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专门从事涉及心理咨询服务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社会组织所开展的工作一般是在政府职能部门要求和指导下,依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展开的。其中有些工作是以往工作的延续和深化,还有些工作是根据新形势,从地方实际出发开拓的新领域。三是政府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社会志愿者和积极分子。从功能上讲,上述三方面队伍各司其职,共同发挥着作用。从需求满足、动机引导和目标设定方面,来思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问题(张建新,2020年)。

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开展之前,原有的体制内人才队伍往往都是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各自完成本领域的职责工作。而现在他们则有更多的机会和场合交集在一起,利用各种的专长,通过联合工作的形式,有针对性地“会诊”,帮扶特殊对象个体。地方喜欢采取“专班”的形式,紧盯高危人群,防止发生人身意外和危及社会的行为。有的试点地方采取精神卫生医师下沉的方式,将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源直接输送到基层社区。下派工作组是党和国家解决基层困难工作的优良经验之一。某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地方也采取了这项措施。应该说这些下派工作组有一些特殊性,就是更具有技术下派的色彩,但也同时行政权威的分量偏弱。在基层社会出现的比较棘手事件中,当事人往往呈现出偏执、过激、顽固等不良行为及心理表现。出于社会治理人性化、文明化要求,以及尽最大可能对当事人进行社会救济和考虑维护稳定发展大局,地方在进行难题难事化解时开始吸纳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

精神卫生科医生下派到基层社区的做法一直处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初期,全脱产式下沉社区主要目的是地方想集中资源着力解决一批历史沉积的棘手问题,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对接基层需要。精卫医师长期在医疗机构工作,“治病救人”、诊治精神类病人是他们的专长。下派到基层社区的好处较多。“送医下基层”体现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卫生医疗、特别是精神和心理类问题救治和干预的重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地方通过制度设计,要求每年一定数量的精卫医师脱离原单位,全身心沉到基层社区工作。精卫医师代表专家系统,具有专业权威性,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也能够增进人民群众对于基层工作的认同和接受。此外,精卫医师在社区直接接触前来求助的人员,能够更为客观地进行科学观察、更为全面地理解精神和心理类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状态及影响。

精卫医师直接从原单位抽调借用到街道,负责所辖若干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业务,在现实中也常常出现一些挑战,问题行踪不定、层出不穷又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不断冲击技术设定的轨道,最终制造出让技术秩序陷入自相矛盾的新问题(彭亚平,2020年)。首先,医疗机构本身专业的精卫医师人手就非常短缺,在面对繁多医疗需求的时候,专业机构往往在使用技术人员方面捉襟见肘。如果再贡献资源、输出技术人员下基层的话,机构确实有自己的难处。目前能够提供精神科医疗服务的专业力量往往集中在专门医院和三甲级别以上的医疗机构。日常大量的求诊者涌向而来,这些有限的机构经常不堪重负,超强的工作负荷导致职业压力剧增。客观上讲,精神科长期以来在整个医疗机构处于边缘冷门状态。医学专业学生大多数不热衷选择精神科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精卫医师在医师体系里也属于小众,职称晋升难度大、显示度不高、待遇也偏低,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受到影响。

其次,精卫医师愿意下派到基层的积极性不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精卫医师作为专技人员擅长的是精神类疾患及心理治疗,在基层社区这类需求问题的比例不高,更多的是心理咨询层面的问题。需要精卫医师出来发挥作用的机会并不是太多。另一方面精卫医师也感到委屈,觉着自己大材小用。普遍认为自己是具有医疗处方权的专业医师,处置精神类疾患和心理治疗科学性很高、很体面。心理咨询由于之前认证制度的设计缺陷,近些年社会上出现对心理咨询师污名化倾向,人们觉得什么层次的人都可以拿到心理咨询师证,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低。受到更为正规、严格、系统和专业化

科学训练的精卫医师自然为了捍卫自己的职业尊严和地位,通常不愿意跟心理咨询师合作共事,也不愿意从事心理咨询类的工作任务,把它们视为小儿科,内心存在敏感的划界。思想观念较为温和的精卫医师不明显表现出对心理咨询的偏见,多数也希望能够同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合作共事。

第三,从病耻感角度来说,社区居民往往有所顾忌,不愿意公开去社区场所求助于精卫医师。下派到社区对精卫医师提出了一些较高的要求。不同于医疗机构的特殊工作环境,真正在社区现实环境则要求精卫医师的就不再仅仅是专业能力了,人际沟通和语言交流能力显得更为重要。而且这种人际沟通和语言交流能力还不同于发生在医疗机构环境中的那种状态。在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角色区分,医生拥有专业判断的高度权威,而患者也通常遵从医生的专业权威,并且患者主动到医疗机构就表明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治的地位,一般都会配合医生。可是在社区环境,干预社区重点关注人员和处置突发事件时,经常需要医生和其他工作专班的人员主动去接触上述对象,往往这些重点关注人员并不配合工作,医生的专业介入许多时候无法顺利开展。同时,这种方式的医疗帮助对精卫医生提出了较大的挑战,要求他们具有较强的临场处置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些方面对于熟悉在专业机构工作的医生来说是个额外的工作负荷。在跟踪干预社区重点关注人员和处置突发事件时,精卫医师的在场介入经常显得有些尴尬。

最后,在预防和干预工作中如何实现不同人才队伍的协调合作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政府从大局出发和社会实际需要的考虑,对精卫医师和心理咨询师都是尊重看待的。事实上,对于精卫医师更是“高看一眼”、更为重视。因为精卫医师相比心理咨询师专业性更高、认证方式更严格。前者内部成员的专业一致性更加显著,而后者内部成员的专业一致性较为分散,甚至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取消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认证。精卫医师作为专家系统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地方政府将他们引入社会心理服务的人才队伍显然是为了提高推进工作的专业权威。只不过,精卫医师擅长精神类疾患的诊治,对于一般意义上属于心理咨询类的问题他们就不一定那么适合。群众普遍因为各方面原因遇到一些心理方面的困扰、精神上的压力、内心里的煎熬等通常都属于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绝大多数人会有自己的纾解措施、发泄途径和各种社会支持,能够较好地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不至于导致心理状态出现大面积的趋坏倾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重视个体心理问题 and 心理障碍的预防与干预。恰恰相反,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个体心理健康素养的塑造和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也更加需要坚持分类对待的原则,让不同类型的人才队伍胜任不同类别的需求对象。

四、参与力量整体动员: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情感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需要社会发展的视角,应该探索社会发展心理学的路径来承担整合学科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任务(王俊秀,2020年)。各级政府高度统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广泛存在于国家行为的各领域。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紧密融洽起来,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国家也特别关心。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凝聚在一起的社会意识和公民习惯,为动员民间力量奉献社会、服务他人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条件。因而,在基层社会发起和组织民间力量参与完成一些心理服务公益志愿活动时,许多人的热情很高。社会全局的民生工作除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之外,离不开社会参与。民间公益志愿类组织是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逻辑特别适合培育和激发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符平、卢飞,2021年)。比如,作为广州街坊优质品牌的广州L区某骑行队就是一个生动的个案。民间力量参与心理服务和心理建设方式更为灵活,内容更为生活化。与专家系统和社会组织专业色彩明显、含有身份差异的心理干预和援助不同,民间力量参与主要是通过

平等对话、看法交流、情绪安抚等拉家常、聊天等方式进行心理纾解。

在心理建设中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人可参与、个个能贡献。由于心理工作的特殊性,并不需要民间力量提供较多的物质资源去进行基础条件的建设。更主要的是引导民间力量贡献人力资本,突出情感支持。把那些具有封闭倾向、需要社会关心的人重点帮扶起来,让他们融入社会,在群体交往活动中逐步化解心结,散去心灵阴霾。要充分认识心理健康素养提升任务的艰巨性;在实践策略上,宜以提升心理疾病应对的素养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江光荣、李丹阳等,2021年)。民间力量是政府资源的极好补充,国家财力不可能无限度在社会领域进行再分配。在地方法针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物质空间与平台初步建立之后,民间力量的柔性参与尤其重要。因为个体心理障碍的有效干预除了必备的专业性介入之外,更大量时间上生活层面的内容展开是需要社会化方面来承接和支撑的。在中国社会关键的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最接近复兴的伟大时期,各类利益资源的生成分配与再分配、生活空间机会的创造与争取、强竞争环境下精神状态的张度与韧性都对人的内心世界带来较多冲击。在心理建设上专业力量和民间力量构成衔接和承载关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就包括分类建设和整体建设的制度要求,希冀从以往零散式、个体化的康复模式向治理型、全局化的战略模式转变。

街道办派驻干部担任中标社会组织的专职书记,这是一种新颖的制度措施。社会组织不仅像以往那样具有正式的官方授权提供服务,同时接受具有官方身份的代表担任社会组织的书记,能够更为自然地无缝对接具有行政职权的政府部门同履行服务职责的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关系。社会组织有市场化的利益追求,尽管竞标阶段官方已经非常详细明确社会组织应当完成的项目计划,但如同所有的契约交易一样,中标社会组织在完成约定任务时可能会有质量折扣、应付懈怠等道德风险和不当行为。派驻书记全天候参与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将角色身份和工作任务嵌入社会组织当中,把心理建设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融入升华到社会组织的工作荣誉感里面。从情感渲染、思想强化、政治塑造、目标指向、效果督导等方面教育和影响社会组织的具体工作人员树立较强的责任感。这些教育和影响途径虽然是制度措施之外的补充,但能够发挥的作用却是非常明显的。创新社会心理服务的供给方式,联合政府、高校、社区和第三方部门等多元力量,建设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专业化、多类型、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吕小康、汪新建,2018年)。行政机构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同其员工之间两种对接关系和契约关系:一种是基层政府以契约合同的形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制度化的正规权威行政机构跟市场化的新兴专业社会组织之间的民生类业务合作。另一种是社会组织以劳动合同雇佣工作人员,这些直接在一线提供心理服务的员工专业资质相对宽松,技术使用的科学标准和专业同一性的严谨程度偏弱。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实效还存在一些评估空白。派驻专职书记能够促进上述两种对接和契约关系效益优化。

派驻专职书记入驻社会组织向外界传递出多重信号。一是体现党和政府对于心理建设工作的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必然认识之一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不仅是重在两头,即事前招标筛选和事后效果考核,还重在过程,即全时参与、全域关注、全程沟通。这种正式的政治和行政力量的输入也让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增强、可信度提高,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感上升,内心普遍接受政府为关心民生而做出的种种举措。而社会组织由此也不是像从天而降的外来服务队,或者仅为牟利而来的服务承包商。二是体现心理建设等民生工作的生活属性。社会组织所面对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应该说需要一定的技术专业基础,但又不能唯技术论。有些时候社会组织往往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资质能够达标,但对当地社区情况却不全然知晓,更没有长期生活在当地社区的经验,没有针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情感和集体记忆。专职书记的角色就能够很好帮助社会组织尽快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为日常中所经常接触的居民心理问题总是同生活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源自实际生活的精神紧张、压力负荷、焦虑抑郁、孤独绝望等心理障碍需要一些科学手段为基础,但更需要以对社区环境的了解、市井生活的熟悉、民情风俗的知晓为根本。三是体现心理建设等民生工作的社会治理价值。心理建设从个案看就是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心理疙瘩、精神负担、行为异常等常见现象。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社区群众的心理冲突初始起因不过就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利益纠葛、或者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几句言语不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在一些起初心理上的怨气不解,往往之后容易放大,久而久之若情绪得不到纾解释放,有的人容易情绪失控,心生愤懑,酿成祸端,不利社会稳定团结。专职书记充分发挥当地生活经验的优势,推动社会组织服务小事,把看似的琐碎细事从街坊邻里和睦相处、以守土有责的使命感处理好完成好。

五、结语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不像有的专项工作那样难度大,总体工作呈现出常规性和整合性的特点。心理属于主观的范畴,而科层制的运作方式往往需要客观的量化指标和数据去推进和评估工作成效,这实际上会成为一个矛盾,但同时又是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在实践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有自上而下的任务部署,其中包括一些量化的指标安排。当然这些指标主要是围绕空间场所、人才队伍、设施配备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而真正属于社会积极心态或者群体心理方面的客观指标并没有提出。原因在于相关工作仍属于初期探索阶段,在一些基础问题的研究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相应的具体科学化的客观指标系统还没有能够厘清,甚至尚属于非常空缺的状态。学界研究特别是我国心理学界的研究以往更多聚焦于实验室的微观研究,而且由于认知科学、脑科学的客观性更强,心理学科技工作者主要精力集中在个体层面。相关成果的个体层次、静态水平的科学性没有问题,或者说问题不大,但研究结论的社会延伸价值较为有限,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科技工作者并不关心成果的是社会转化问题,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主业;但另外一方面也让人怀疑和警惕的是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否只是发表在期刊上高大上,而实质上放在社会生活中就很容易失去生命力,解释效度偏低,以至于基本处于应用价值脱节的尴尬状态。

国家需要鼓励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包括心理学专家勇敢走出象牙塔,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破除认为心理学只有在实验室产出的才是科学的成见。我们并不是狭隘坚持专注实验室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不对,而是认为同时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同国家现实的社会治理需求结合起来,需要思考精致化的、剥离生活场景的研究结论如何在实际生活加以丰富完善,并且介入和干预现实的心理问题,从全场域、过程化、综合性的角度完整解析某类心理问题的规律。探寻我国文化背景下基础社会动机与社会经济行为、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为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心理学依据(陈雪峰、滕迪晴等,2020年)。避免只是为了追求期刊论文的学术性,以所谓学理至上的偏差压制实际问题的社会性;避免只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心理科学研究,而将实际问题的多方面复杂因素人为简化或者视而不见。抽离和裁剪一些因素固然是心理学基础研究的需要,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些优化之后的研究再返回到生活场景时一定必须再加工,以发展的眼光深化认识,思考科学形式的成果在社会治理中怎样才能够更加接地气,以便让心理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焕发生命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治理价值。

参考文献:

- 陈雪峰、滕迪晴等,2020:《基础社会动机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吕小康、汪新建,2018:《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心理科学》第5期。

- 彭亚平,2020:《照看社会:技术治理的思想素描》,《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符平、卢飞,2021:《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江光荣、李丹阳等,2021:《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与特点》,《心理学报》第2期。
- 王敬波,2020:《面向整体政府的改革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王俊秀,2020:《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策略与基本内核》,《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王韶兴,2021:《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吴忠民、贾双跃,2018:《中国政治精英优势与现代化建设》,《人文杂志》第6期。
- 辛自强,2018:《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心理技术与应用》第5期。
- 张建新,2020:《关于疫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个人思考》,《心理与行为研究》第6期。
- 张淑敏、吕小康,2021:《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政策语境与行动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责任编辑:蒋永华)

Social Embeddedness in Ensuring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U Li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carried out from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s" developed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expanded experimental projects carried out in the "pilot areas". From these projects, some important preliminary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ffered currentl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ensiveness in the care for people's livelihood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nsiderable long-term social interests. It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of the Party in its exploration of good and effec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direction,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are dovetailed with local implementation, refined work, and task decomposition, reflecting a good coordination taking plac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pilot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power elites' leadership reflects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in ensuring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functioning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ly ensu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the mobilization of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ensures the institutional forces supporting the psychological care for enhanc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overall mobilization of different participating forces creates the social emotions for ensuring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words: national mobilization; power elite; operation architecture; professional system; participating force

About the author: Wu Lin,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97).